

從經濟學談社會指標研究之 學術化與方向

費 景 漢

大致上，指標為一包括價值判斷（value judgement）而描寫社會現象的指數。利用指標，我們就可以做社會間的比較。舉例來說：美國於世界大城都設有大使館及領事館，而外交人員皆不願意到環境不好的城市工作，所以美國外交部就根據世界各大城市的氣候、學校、醫療設備、文化娛樂活動……，編了一個「不舒服指數」（a discomfort index），依據這個指數，將外交部人員輪調以示公平。這個指標就具備了三個意思——(1)它為一主觀的價值判斷。(2)它為一個指數。(3)它描寫某一種社會現象。

經濟學的社會指標中，最基本的指標為富足指標。依據經濟學家的構想，是將全社會的生產因素——勞工及資本物——投入生產部門，所生產產品的價值，稱為國民生產毛額（GNP）。而生產過程中，支付給各生產因素的工資及財產收入總和就稱為國民所得。於是我們可以將平均每人國民所得（per capita national in-

come) 稱爲一國家的基本富足指標。爲何將它稱爲基本富足指標呢？因爲我們大致可將社會指標分爲二大類，一種屬於物質性的社會指標：大致包括教育、健康、醫療、營養、環境、休閒。另一種屬於精神性的社會指標：大致包括參與、公平、衝突的解決、心理的狀態、文化精神的活動。如果我們接受此一區分，則大致上物質性的社會指標與每人平均國民所得有高度的相關性；意思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每人國民所得逐年增長，則大致上它們就可以解決教育、健康……等物質性的社會指標。相反的，精神性的社會指標非但可能與每人國民所得指標沒有關係，甚至可能有負相關，因爲每人的國民所得必須透過努力的工作及高度的競爭，方才可能逐年提高，可以想像這種競爭性的社會常常會妨礙到精神性的社會指標，諸如：競爭是否公平、是否有參與的機會及衝突的可能、競爭是否讓我們感到壓力。故研究社會指標問題時，如果想解決物質指標的問題，大致上說，應注重經濟發展；如果想解決精神指標的問題，則就較經濟發展更爲複雜了。

我們可以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成工業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大體說來，工業先進國家爲每人平均所得高的國家，而開發中國家爲每人平均所得低的國家。開發中國家應注重物質性的社會指標，工業先進國家則應注重精神性的社會指標。台灣現處於非常特殊的地位，與韓國、星加坡、香港被世界學者並稱爲亞洲新興工業國家 (new industrialize country in Asia) 大略來說，比我們每人平均國民所得顯著偏高的國家爲工業先進國家，而比我們每人平均國民所得顯著偏低的國家爲開發中國家，故我們國家不只應注重社會性指標，亦應兼顧精神性指標，所以現階段爲最困難研究社會指標的一段時期。

我們前面談到社會指標皆具有價值判斷的意義，然而「學術化」的重點不在於價值判斷，而在於社會指標的決定性 (determinism)，亦即什麼樣的力量決定社會指標的大小才是社會指標研究的核心，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社會指標如果只談到價值判斷的話，則這種社會指標幾乎就沒有學術價值，故由學術觀點來談社會指標，我們就應該忘了它的價值觀念。舉個例來說，我們前面談的每人平均國民所得

，它有兩種意義，一為總收入除以勞工人數（per capita income），一為總產品除以勞工人數（per capita GNP），此二者於經濟學為合而為一的概念，後者所描寫的為平均工人生產力（per capita productivity），當我們從所得概念轉成生產力概念時，我們就可以探討何種力量決定生產力的變動，這就成為一決定性的理論了。經濟發展學的核心就是在探討如何透過資本累積、人口增加、技術進步來影響生產力的變動。

，從經濟的眼光來研究社會指標時，除了要注意決定性以外，還須要注重系統化。系統化表示將全國主要生產現象予以聯結的經濟運行觀，而運行觀代表資源運用的概念、資源分佈的概念、生產的概念以及消費的概念。

經濟學家除了研究基本富足指標外，還有另外一個工作，就是研究公平指標。經濟學家如何研究公平指標呢？第一步工作就是將運行觀的理論體系予以擴大。我們知道，社會的單位是家庭，家庭的概念在傳統經濟學幾乎已經消失，故要將經濟理論擴充時，第一步就是要將家庭的概念加入經濟系統。加入的方法很簡單，由於生產因素（勞工、資利物）為各家庭所占有，於是每一個家庭的所得為各該家庭所擁有工資收入與財產收入之和，將既成理論擴大所得到的為家庭收入的型態（family income pattern），而學術化的初步工作就是衡量這個型態的不平均度。我們有許多指數來衡量所得不平均度，其中一個就是吉尼係數（G_i），這個吉尼係數與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就是經濟學家所看到的均、富指標，所以說，均與富這二種指標是在同一個運行觀的理論系統中得到的。

全國家庭收入不平均度雖然也有社會福利的意義，可是，我們要問的是：什麼樣的力量決定一個國家家庭收入的平均與不平均呢？談到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觀察的證據來看：大致來說，台灣過去三十年經濟發展的速度幾乎是世界的首位，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我們家庭收入的平均度也在逐漸改善，並且這種改善的成果亦被世界學者所稱道；但是有沒有理論來解釋這種成就呢？吉尼係數的福利意義，經濟學家從本世紀開始就注意到了，可是談到何種因素解釋所得分配的平均度之研究

，那就是晚近十幾年方才開始著手，故早期六十年的研究始終不是學術性的研究，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成立以後，第一項工作就是做這方面的研究，這在世界上是一創舉。

昨天到中山大學上課，我問了學生一個問題：「國父有沒有一個理論解釋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什麼力量使它趨向於平均的？亦即是說，有沒有一個解釋台灣經濟發展使家庭所得分配逐漸改善的理論？」。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說又有又沒有。大致上來講，他有一個理論，但却又和台灣沒有關係，因受時間限制，我讓諸位去把它找出來，在這裏我無法談到。但我要強調的是使三民主義學術化的重點仍舊在於決定性——什麼樣的力量決定不平均度。其實，說了半天，仍舊是一個常識，因為研究一切的社會指標，例如研究衝突指標而言，我們所要研究的不在於沒有學術價值的「衝突是好是壞」，而在於有學術價值的「什麼是造成衝突的原因」。

最後，我要談到新的研究方向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在研究社會指標的時候，應朝何種方向研究呢？我想：應朝跨越部門作研究，因為現行的理論將許多社會現象分割成互不通風的部門，於未來的研究，經濟學家應該與別的社會科學家攜手合作，這也是本次社會指會指標會議召開的主要目的。在談到跨越部門研究的時候，我在這裏願意提出以下的建議：經濟學家在與別的社會科學家合作的時候，應該注重物質性的社會指標，因為物質性的社會指標多半是有數量化的可能，而數量化正是與經濟學家合作研究的先決條件。除此之外，要使兩類專家學者有合作的可能，多半還得將其納入經濟運行觀，成一更大的系統。

大致而言，經濟學家可以與那些學者合作呢？我想：最可能的為人口學家及社會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有一點可能，與政治學家則不可能。所以，以下我想舉現在與過去九年中，經濟學家與別的社會科學家合作的幾個例子來談談：

(一)世界銀行之研究。世界銀行在研究貧窮國家的社會指標時，所注重的為物質性的教育、健康、營養三大項。如果將生產部門分割成幾個小部門，傳統的分割方

法就是分割成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爲了研究社會指標，我們可以再加上教育、健康、營養的部門，而全國生產資源不但要分配給農業及工業，也要有資源用於教育、健康、營養。世界銀行的研究構想就是朝此方向進行的。

(二)新家計學 (new household economics) 之研究。經濟學家還有一將理論系統擴大的研究爲新家計學的研究，他們將全國生產因素區分成二個部門(1)市場性的生產部門。(2)家庭的生產部門：家庭生產包括婦女在家庭中照顧小孩、洗衣做飯、傳播知識……等有價值的生產工作，這種生產性工作沒有被傳統經濟體系所包括，如果我們將這些生產性工作予以考慮的話，所得到的不是國民所得，而是近代經濟學家及家計學家所強調的全部所得 (full income)。

(三)與人口學之結合。經濟學家研究家庭所得不均度有很強烈與人口學結合的趨勢，開始時，也是將傳統理論體系擴大，而擴大的方法，就是將勞工依據年齡、教育、性別……予以分化，因爲我們知道人口學的出發點就是要注意人口的年齡結構。這裏面有許多題目可以研究，在這裏，我只提出下列二個研究題目(1)經濟人口與社會保險的研究。(2)全生所得 (life income) 的研究。

四與社會人類學之結合。這個研究的出發點爲家庭矩陣，從這裏可以觀察到各個家庭人口的年齡分佈及全國家庭成員的組成 (membership of composition of family)。也就是研究家庭組成法則、家庭大小變化的法則、家庭親屬的關係，得到諾貝爾獎的 Kuznets 即以此角度去研究家庭所得分配。另外還有所謂的世襲關係，因爲所得分配與家庭世襲制度有很大的關係，這個主題我們迄今尚未設立任何理論模型來研究，但這個研究的重點不在研究所得的不平均度，而在於機會是否平均，因爲你有一個好爸爸就自然可能比沒有好爸爸的人有更大的機會成爲一富有者。

總而言之，社會指標的研究，經濟學家有其研究重點，而很有和其他社會科學家合作的可能，所以，我覺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與其他機構來合作研究，有一非常光明的遠景。多謝大家。